



美国最杰出华裔作家 哈金《南京安魂曲》国内出版 把南京大屠杀 写成世界挽歌

“

在美国历史上，成功的华裔作家并不多见，哈金毫无疑问是其中最著名的一个。1999年，他凭借小说《等待》获得了美国国家图书奖，这个有着50多年历史的奖项，是美国文学界最重要的奖项，哈金也是有史以来第一个获此殊荣的华人。

《等待》之后，哈金一举杀入美国主流文学圈，10多年下来，几乎拿遍了各种奖项，哈金成为“美国历史上公认最杰出的华裔作家”，如今他在美国波士顿大学担任文学教授，刚刚创作完成的《南京安魂曲》已由《收获》杂志全文发表，国内中文版由时代华语出版公司与江苏文艺出版社共同出版，同时英文版也由美国兰登书屋在10月18日同步推出。

□快报记者 陈曦

靠写作在美国生存 朋友都说他疯了！

哈金原名金雪飞，1977年考入黑龙江大学英语系，1985年在山东大学取得美国文学硕士学位，并于次年赴美攻读博士学位。因为美国人很难发出雪飞这个首音，又因为喜欢哈尔滨，于是取笔名哈金。母语是中文却靠英语写作的哈金，在考上大学前，基本算是个文盲，只读过四年小学。

美国博士毕业后，当中国朋友得知哈金想靠英文写作在美国生存时，大家都说哈金疯了，这简直不可思议。那时大家为了找到好工作都改行学其他专业。在尝试过几份和中文有关的工作失败后，哈金进入波士顿大学写作班学习。1993年，写作班还没毕业，哈金被艾默里大学聘用教诗歌，学校要求每年都要发表东西，四年后根据发表的东西决定是否继续雇用。在聘用的前三年，哈金没有一本书出来，压力巨大。有一段时间他天天给各种文学刊物投稿，但邮箱收到的都是退稿信。妻子受不了，规定他吃饭前不准看邮箱，怕影响吃饭的心情。

1996年，哈金的短篇小说集《词语》出版，第二年，获得了“美国笔会/海明威文学奖”，情况才稍微好转。直到1999年长篇小说《等待》获得国家图书奖，情况才彻底改变。

如今的他任教于波士顿大学英文系。主要教授创意写作、移民

文学和诗歌学的哈金，虽然在美国待了25年，并坚持用英语写作，但几乎他的所有作品，都与中国或者华人有关。如果说没有融入美国主流社会，哈金也不太同意，“在美国没什么主流，这里就是大杂烩。”

从文学角度看，先后获得美国国家图书奖和福克纳奖的哈金，树立了其在美国主流文学界的地位。不过，他说，用英文写作20多年依然很不顺手，“我是用残废的英文写作。”

哈金的写作总是在华人移民社会与中国现实历史两端游荡。哈金写中国、写华人，但正如学者王德威对他的评价——“他从来没有写一个小说只是为了卖中国传统文坛、东方主义。”

付出代价 才能获得真正的自由

作为一个移民作家，哈金在美国文坛一路奋斗写出来，个中年辛酸苦辣难与外人道。“有一段时间觉得自己仿佛进了拳击场，前后左右都得应付。”

哈金说，由于自己是外来者，用英文写作必须写一般美国人可望不可及的程度，他们才能接受。

中国人说“一言丧邦”，美国文坛倒真可以说“一言丧书”。哈金介绍，美国虽不像中国，但他们有大的媒体，有一套机制来控制；“像《纽约时报》书评，如果你第一本书出来，它给你一“个劣评，你就好几年缓不过气来。我有个黑人作家朋友，第一本书出来得到一

个劣评，多年抬不起来。”哈金的一位老师，是个老作家，也因为《纽约时报》对他的书评不佳，书店把他所有的书全部退回来，“八千本呢！到现在多少年了，他什么也不敢写。”

哈金介绍，这几家书评媒体之间也有联系，有一家不好好评，另几家也都不给。“不过，好在美国的文坛没有人能够永久控制。”

对美国文坛诗苑的盘根错节，勾心斗角，哈金在小说中有生动的描绘。

“艾默里大学雇我当助理教授时，系主任休假没在，聘我不是他决定的，他就百般看我不顺眼。系里开会时我每说一句，他就噁我一句。”系主任跟哈金所在项目的老板不和，这位老板原来在耶鲁教书，出过很多著作，系主任请不动他，就认为哈金是他的人，就来整哈金出气。

这是第一份工作，怎么受气也得坚持，据他的妻子回忆，那段时间，哈金一往学校走，肚子就开始疼；回来肚子鼓老大，儿子和我就给他按摩。我们要他辞职，他不辞——他就是犟！那几年遭了罪啦！他憋了一肚子气，白天晚上废寝忘食写东西。

哈金苦心琢磨如何让闪现在脑海里很久的人物走出来，他用写作驱走焦虑，也用写作显示实力。直到他出的第四本书《光天化日》获得奥康纳奖之后，系主任态度才变了——他已经赶不走哈金了，哈金的处境这才大为改观。

难怪《自由生活》的献辞是：“献给丽莎和文，本书里有他们的身影。”哈金说，妻子与儿子最重

要的贡献就是“在我写作时，能有一个稳定的家——好多年了，有不顺利的事，就得回家养息，靠家里人的安慰。”

不过，在哈金看来，“这些都是一个过程”，“付出代价才能获得真正的独立和自由”，想起那些有才华而没机会的人，“自己非常幸运”。

写大屠杀改了32遍 一边写一边哭

2008年，哈金开始构思《南京安魂曲》。然而困难重重，写不动，找不到角度，“直到改到第32遍才找到这个角度。”在写作的3年多时间里，哈金一直生活在70多年前南京的气氛中，“经常哭完了还得写下去。”

此前，涉及南京大屠杀题材的作品很多，但多以非虚构的历史写作为主。其中，在世界范围内最有影响力的，就是已故的美国华裔女作家张纯如的《南京大屠杀：被遗忘的二战浩劫》。

张纯如实地采访了多位大屠杀幸存者，并佐以大量历史档案和第三方当事人的日记和书信，多视角回溯了南京大屠杀这一历史事件。书中讲述屠杀发生时“中国人个体的失败、绝望、背叛和幸存的经历”，2004年因精神压力过大张纯如自杀。

与张纯如相比，哈金这个关于南京大屠杀的故事，是从一位美国传教士安妮·魏特琳的视角进行叙述。所以哈金说，本质上这也是一个关于美国的故事。

《南京安魂曲》是以美国传教

士安妮·魏特琳的视角，叙述南京大屠杀以及大屠杀之后的故事。这部小说参考了明妮留下的日记。日记如实记述了整个南京大屠杀期间的日本军队暴行和在南京的外国人的救助行为。与其他同类主题的作品相比，魏特琳的日记远不如《拉贝日记》有名，影响力也不及后者。

不过，10年后能够在大陆再次出版自己的作品，哈金感到“挺意外的”，“一开始都觉得没有太大希望，可能《南京安魂曲》这个题材，大家都能接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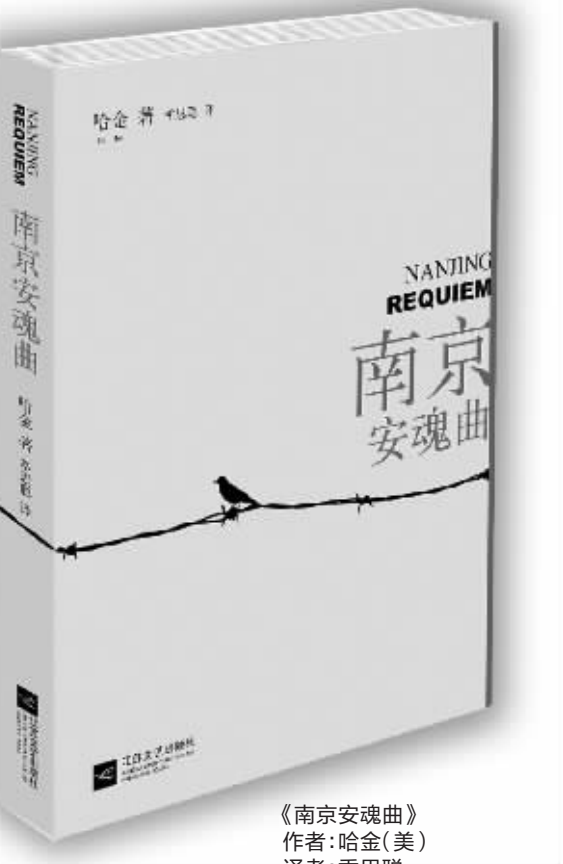
余华在序中写道：“我只用一个夜晚就读完了哈金的新作《南京安魂曲》，我不知道需要多少个夜晚还有白天才能减弱这部作品带给我的伤痛。我知道时间可以修改我们的记忆和情感，文学就是这样历久弥新。当我在多年之后找回这些感受时，伤痛可能已经成为隐隐作痛——那种来自记忆深处的疼痛。身体的伤痕可以愈合，记忆的隐隐作痛却会旷日持久。”

2004年一世纪末能回国的哈金，四分之二向北京大学递交了应聘教授的申请，结果北大没有任何回应。有人评论说，“没有回应”或许“也是一种进步”，北大总不可能对一在美国好几所名校专门教授英语写作、写了很多获奖作品的著名作家回信说“你不符合资格”吧。“没有回应”，是因为“不便回应”。

哈金告诉记者，母亲病了，他目前的最大愿望是能回国一次。

写过《等待》的哈金，依然在“等待”。

对话哈金： 母亲病了 我很焦心 想回去探望



“想把民族经验 延伸到国际经验”

染周刊：《南京安魂曲》的内地出版单行本近期已由江苏文艺出版社发行，您怎么会想到写南京大屠杀的这段历史？是不是明妮·魏特琳的故事打动了您？

哈金：一开始觉得这还是文学上的一个空白，比较理性地决定写这个故事。选择从魏特琳的经历写，主要想通过她把民族经验延伸到国际经验，当然这是在写得好的前提下。其实，我开始并没有特别被魏特琳个人的故事感动，写了半年多也无法在感情上跟她沟通，所以故事有些干巴巴的。直到有一天早晨我写下了一个句子说她听到同事们谈巴特·勃兰姆斯、门德尔松时，她总是感到云里雾里的，因为她只知道贝多芬。她是穷苦出身，没机会接触艺术和音乐，所以她努力给南京的穷人创造受教育的机会。写了那个句子我就去上班，一个半小时的路上泪流不止。那是头一次真正被她打动。但后来由于换了叙述角度，我就把那句话拿掉了。

染周刊：为什么起了这个名字——《南京安魂曲》？

哈金：主要是因为喜欢勃兰姆斯的音乐，他的《德意志安魂曲》广为人知。书的这个名字很庄重，本身就是对自己的挑战。就是说必须写得书符其名，否则就要出丑。其实，我给自己出了个难题。写作过程中曾放弃过两次，实在写不动了，但不甘心，又重新做起。

染周刊：你前两部作品《落地》和《自由生活》写的都是美国华人移民生活，这次《南京安魂曲》又回到了中国和中国历史，在写作题材上，似乎有些往“后”退，为什么有这么个转变？

哈金：在我看来，从某种意义上《南京安魂曲》还是一个美国的故事。关于西方人在南京大屠杀期间的经历，我们一般都只知道拉贝他们，但事实上美国人介入得更深。因为拉贝很早就离开南京了，而不像美国传教士，他们待的时间更长。而且他们回国之后，还受到美国官方的调查，调查他们与红色中国的关系。所以，美国传教士在南京大屠杀期间救人的经历，在美国是被忽略的。

染周刊：《南京安魂曲》本质上还是一个中国故事，一股民族的苦难耻辱史，您的美国读者能理解吗？

哈金：我相信他们能理解。《南京安魂曲》的读者还是美国人。我之所以选魏特琳作为小说主角，是因为她是美国人。在我看来南京大屠杀也是美国经验的一部分，当然这对他们来说是光荣的一页。昨天联合新闻(Associated Press)的书评说：这本书“应该是任何不熟悉当时在南京发生了什么的人的必读之书”。另一个书评说此书“深深地感人”，文学起码是要能穿越文化和国界的。

染周刊：其实你这部小说的重点是写屠城之后几年的南京，以及这群留下来的西方人的生活。

哈金：我主要想写战争对人精神的摧残，写苦难在人心里的沉淀。以魏特琳的经历为切入点就必须这样写，因为这是真人真事，她在大屠杀后又活了三四四年。真正难写的是这没有发生巨大事件的三四年。

“如果写得不好 其他责任无从谈起”

染周刊：虽然南京大屠杀是那么重要的历史，但其实在西方知道这段历史的人并不多。不知道张纯如的《南京大屠杀》在美国的影响如何？她的死在当时引起了什么样的反应？

哈金：她的书影响很大。当然大多数人是不读书，并不知道《南京大屠杀》。她的死倒没有广为人知。

染周刊：您在写这本书时，有想过通过写作来传播这段历史吗？写作此书，是基于作家的历史责任感还是别的什么吗？

哈金：我要写一部文学作品，要把历史上升为文学。要说责任感，主要是要对自己的艺术负责，因为如果写得不好，书就站不住，其他责任就无从谈起。

染周刊：张纯如写完《南京大屠杀》后因为无法排遣的痛苦自杀了，我不知道您写完这本书后的心情是怎样的？

哈金：写完心里倒安静了许多。但在写作过程中常常很沮丧，不得不沉浸在七十多年前的南京的气氛中，经常哭完了还得写下去。我理解张纯如的心境，写这种书是会伤害作者的。

染周刊：大屠杀发生在南京，您到过南京吗？对这个城市有何印象？

哈金：八十年代初做研究生时去过一次，当时觉得南京的食品比北方城市要好许多。由于小说写的是七十多年前的南京，我主要依靠案头工作和大量的照片。遇到拿不准的地方，我就问警察。她是我以前的同事，也是朋友，是在南京长大的。

放弃母语是巨大损失 但不会贸然回到汉语写作

染周刊：用移民国语言写作中国故事，您觉得自己到底算中国作家，还是算美国作家？

哈金：我是美国华人作家，但我毕竟在中国长大，头三十年是在中国度过的，要把自己跟自己的过去拆断是不可能的。这是为什么纳博科夫一方面坚称自己是美国作家，一方面加强自己跟俄罗斯文学的连接。原则上我认同纳博科夫的姿态，但他是通过语言来跟俄罗斯连接的，没转向英语前用俄语写了很多作品，之后也翻译了一些俄国作品，我想通过别的方式，《南京安魂曲》也是这种努力的一个尝试。纳博科夫还说过他的护照上只有一个词：作家。这一点是最重要的，必须艺术第一。

染周刊：您是华人，写华人题材，又用英语写作，这其实是一个不太大的阅读群体，您担心作品市场吗？那您的小说读者会是谁呢？

哈金：我不考虑具体的市场，心中只有一个抽象的英语读者，但我坚信真正的文学作品会找到读者的。其实，我的作品还是有其市场的，已经被翻译成三十多种语言。在台湾也有比较稳定的中文读者。

染周刊：您将来会回到汉语写作吗？

哈金：我有点把握的是，如果用汉语写作，成就可能会大一些。汉语写作和英语写作，整个方法都不一样。但如果用汉语写作的话，你得进入汉语的环境中，这是最难。如果我用汉语写作，我得想，我能给汉语带来什么？

所以是不会贸然回到汉语的。用英语写作的劳动量是挺可怕的，放弃母语也是巨大的损失，但人的生命有限，两个语言之间几个来回，一辈子写屠城之后几年的南京，以及这群留下来的西方人的生活。

染周刊：为什么您不自己翻译成中文，而是委托给别人翻译？

哈金：我翻译过两次，《好兵》是跟太太合译的，《落地》是我自己译的，都是短篇集，我可以在中文版版权后卖出就早早动笔。其他的主要是因为没时间亲自做。一本书的合同一签，出版商要给一定的期限，多数情况下我正在教书，无法及时完成，所以只能求朋友来译。

染周刊：《战争垃圾》以后，人们关注您的转型，从叙述早年在中国的故事转到讲述近年在美国的故事。这不仅仅是人物身份、背景转换吧？

哈金：当然有关。可以说，我的书大部分跟自己存在的方式有关，往往产生于危机之中，这应当是正常的状态，作家如果活得安稳，可能会缺少心理的强度和精神的亢奋。

染周刊：《战争垃圾》和《南京安魂曲》都是关于战争的小说，不是一直对战争中的复杂人性和人际关系有叙述的冲动？二者有不同吗？

哈金：在结构上很不相同，《战争垃圾》是回忆录式小说。虽然《南京安魂曲》也是第一人称叙述，但讲的是两个故事，既是魏特琳的经历也是一个中国家庭的经历，在技巧上要难许多。还有，魏特琳是真实的历史人物，没发生在她身上的重大事件不能虚构，这就给写作出了更多的难题。

“不少出击的拳头 来自华语世界”

染周刊：您写《自由生活》，有人说这本书的主旨是“反美国梦”，有人推断这本书“能阻止好多人到美国来”，中新社有一篇编译文章《美华裔作家哈金：追寻“美国梦”的征途没有自由》。您自己怎么看？

哈金：那只是不同的阐释。这是一个关于成长的故事，付出代价才能获得真正的独立和自由，选择和付出代价正是自由的含义。作为一个独立的地方，我就问警察。她是我以前的同事，也是朋友，是在南京长大的。

染周刊：对美国文坛的勾心斗角，您在《自由生活》中有生动的描绘。您在美国文坛一路奋斗写出来，有过移民的不适应和辛酸的往事吗？

哈金：有很多，但这些都是一个过程。有一段时间觉得自己仿佛进了拳击场，但前后左右都得应付，不少出击的拳头来自华语世界。我是恩怨分明的人，不会健忘，还没达到米沃什那种“所有对我的恶行我都忘了”的境界。

染周刊：作为移民作家，您之前说过您感受最深的是“外来精英和本地精英的冲突”。这种冲突体现在哪些方面？

哈金：外来者终究是外来者。米沃什就说过他只是个难民，但他仍感激美国给他了生存的空间。我本人并不把那些冲突看得很重，因为文学不是眼下的事情，那种说法是采访者提出的，我觉得的确存在那种冲突，特别是利益相争之时。资源就那么点，当然本地精英要排斥外来者，身为外来者，也没必要去争什么。当然，我现在的处境可能比别的外来者要好些。我常常想起在中苏边境服役时，头两个月连饭都吃不饱，所以比起那些战友们，自己非常幸运。他们当中有很多人智力过人，但从没机会发展自己。

“如果能拿到签证 我很快就会回去”

染周刊：您在国外多年，会关注国内小说的写作吗？觉得这几年不错的作品有哪些？

哈金：工作太忙，一般只能读几位国内朋友的作品，所以说不上面。

染周刊：听说您多年前向北京大学递交了应聘教授的申请，结果北大没有任何回应？

哈金：那是2004年的事。我当时刚拒绝过耶鲁大学英文系的一个讲座教授的位置，知道北大英语系有一个教现代英美诗歌的空缺，希望以后能每年去北大教一个学期的课。我在申请中跟他们提到了耶鲁的工作，但从未听到北大的回话。

染周刊：为什么出国20多年一次都没有回国？中国对您来说遥远么？

哈金：并不觉得遥远，反而觉得对中国更能从宏观上把握。但写作需要更多微观具体的东西，这些还得身临其境才能掌握，没能回国有各种各样的原因。我母亲最近住院了，我很焦心，想回去探望。

染周刊：这次《南京安魂曲》在内地出版，您会考虑回来看看吗？

哈金：当然。如果能拿到签证，我很快就会回去。母亲年纪大了，拖不起。